

“长征”概念的历史流变与话语建构

颜悦

南昌职业大学, 江西省南昌市, 330000;

摘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 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更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本研究以“长征”概念的流变为中心, 深入考察其从早期用词的萌芽到正式概念的确立, 从革命英雄史诗的具象化构建到新中国成立后“新长征”的拓展演变, 直至新时代回归经典长征精神的历程。研究旨在廓清“长征”概念的逻辑抽象过程, 阐明其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和“行动”意味, 并探讨其在新时代语境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能动指导作用, 为红色基因传承和思政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鲜活案例。

关键词: 长征; 概念流变; 实践表达; 红色基因; 新长征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4. 049

引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 构成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中“红色基因”无疑是其最鲜亮的底色。“长征”,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 不仅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壮举, 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其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世代相传, 成为激发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对“长征”概念的研究, 不应仅仅停留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层面, 更应深入其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实践表达”功能。

当前, 国内外学界对长征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既有学者关注“长征”概念的形成及演变, 如高华认为, 1935 年 5 月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及“长征”, 而毛泽东在同年 12 月的报告中则首次对其作出了全面的政治解释, 使“长征”一词从此载入史册^[1]; 石仲泉则认为, 1935 年 2 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最初使用了“长征”一词, 在 5 月朱德布告发布后“长征”便广泛使用^[2]; 孙力则持不同看法, 认为早期用词不能等同于概念理解, 直到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才真正赋予长征概念以深刻意义^[3]。其次, 有学者从“长征”的宣传功能、概念建构与传播角度进行考察, 如毕耕、谭圣洁分析了长征途中报刊宣传的作用^[4]; 许加彪、张宇然关注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5]; 杨才林则探讨了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6]。此外, “新长征”概念的形成与传播也成为研究热点, 韩洪泉指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与规划是“新长征”的滥觞, 1978 年是“新长征”的元年^[7]; 李东方则认为, 虽然 1936 年 2 月党内文献中已有“新的长征”一词, 但直到 1949 年毛泽东提出“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后, “新的长征”才逐渐演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长征”^[8]。

前述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细致审视, 仍存在一些探讨空间: 其一, “长征”概念提出并形成过程在学界仍存争议, 有待进一步廓清; 其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叙述, 对 1949 年以来“长征”概念的演进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表达”功能的深度考察仍显不足。鉴于此, 本文章旨在以“长征”概念的流变为核心, 从概念史视角, 深入考察其从感性用词到理性概念的逻辑抽象过程, 从历史事件到革命史诗的具象化建构, 从“长征”到“新长征”的拓展演变, 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下向经典长征精神的回归与重构。通过厘清“长征”概念的流动线索, 揭示其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和能动作用, 从而为新时代红色基因的传承和思政教育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更为生动的教学资源。

1 长征概念的萌芽与初步界定: 从感性用词到理性抽象

“长征”一词并非凭空出现, 其早期用词的萌芽阶段, 体现了从红军将士的亲身经历、感性认识中逐渐提炼、升华的过程。深入考察这一过程, 对于理解“长征”概念的本质和内涵至关重要。

1.1 早期用词的出现与修饰性表达

在红军战略转移初期, “长征”一词尚未作为一个固定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这些早期的提及, 往往作为一种修饰性动词或概括性描述, 用以形容红军部队所进行的“长途行军”、“远征”或“战略转移”等行动。例如, 部分红军(主要指红一方面军)为突破国民党围堵而实行的内线作战突围行动, 其艰苦性、距离长远性自然而然地促生了“长征”这类描述性

词语。

然而，彼时的“长征”用词，更多停留在对客观军事行动的描述层面，尚未被赋予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意义。它是一种基于感性经验的直接表达，而非经过理性分析和政治阐释后形成的概念化名词。用申报书中的话来说，这些早期用词“仅是修饰性动词”，指向的是“部分红军实行内线作战的突围行动，并非概念化名词”。

1.2 毛泽东对长征内涵的初步界定与概念确立

“长征”真正从一个修饰性动词升华为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的理性抽象和政治赋予。申报书明确指出，直到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才真正赋予长征概念意义^[3]，并对其作出了全面的政治解释。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中，毛泽东首次对“长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高度概括。他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9]这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将三大主力红军“作阵地大转移”这一共同本质属性加以总结概括，将感性的军事行动提升到了理性的政治高度，赋予了“长征”概念性的内容，使其正式建立起来。

2 革命英雄史诗中长征概念的具象化与早期构建

长征概念的形成并非止步于理性抽象，它同时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象，从概念到叙事，从历史到史诗的构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长征”被赋予了强大的词义承载能力，形成了广泛多样的具象化表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英雄史诗的重要元素。

2.1 “万里长征”中的苦乐交织与革命意志

长征的具象化，首先体现在对长征艰苦卓绝的物质条件的描述，以及红军官兵所展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申报书指出，长征是“国民党长途围截和红军殊死拼搏过程，在中共话语体系，万里长征就是‘万里长追长跑’，体现中国共产党广大群众基础和情感支持”。这种表述生动地描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红军所面临的险境。

然而，长征的叙事并未止步于“苦难”本身，它更强调了在极度困苦中孕育出的革命乐观主义。如谢觉哉所言，“长征的‘苦’与‘乐’即是长征核心词语，也重新构建了长征叙述话语体系，长征之艰难举世罕见，苦难自然是要说说”^[10]。这种“苦乐交织”的话语，深刻揭示了长征的辩证统一性——既有物质上的极端匱

乏和肉体上的极限考验，更有精神上的坚韧不拔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它展现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将长征塑造成一部充满苦难却又洋溢着革命激情的英雄史诗。

2.2 转危为安的标志与历史性转折

长征的具象化还体现在其作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重要转折话语与标志”的叙事建构上。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以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正是在这样极其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最终使红军顺利入陕。

因此，长征不仅是战略转移，更是党在极其复杂和险恶的环境中，通过自我纠错、实现历史性转折的伟大实践。长征的叙事，突出强调了其在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熟和走向胜利的标志性事件。这种叙事，深刻阐明了长征所蕴含的“曲折和前进辩证统一、光明与黑暗搏斗、思想路线尖锐斗争”等哲学内涵，使其成为教育后人识别真理、坚持正确路线的生动教材。

3 “长征”到“新长征”的拓展演变与现实重构

长征概念并非僵化不变的语言表达，它随着具体历史语境和特定历史任务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生成，形成具有“语言行动”意味的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开拓新局面的重要精神资源。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长征”概念逐渐拓展演变为“新长征”，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

3.1 “新长征”概念的滥觞与历史演进

“新长征”概念的提出，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旨在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李东方考证指出，1936年2月党的文献中便已有“新的长征”一词，但其真正获得广泛的象征意义，则是在1949年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之后^[8]。这句话深刻揭示了革命胜利的阶段性，预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一个开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发扬长征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规划，构成了“新长征”的滥觞与酝酿，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被视为“新长征”的元年^[7]。这表明“新长征”的话语，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核心任务紧密相连。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时期,它意味着百废俱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将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初步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它意味着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路。

3.2 “长征”与“新长征”的内在逻辑与递进性

将“长征”和“新长征”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递进性。首先,从精神实质上看,“新长征”继承了“长征”所蕴含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创新等核心精神。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还是和平建设年代的“新长征”,其核心都在于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断奋斗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其次,从历史任务上看,二者具有阶段性和延续性。“长征”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长征”则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递进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保持战略清醒,不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逻辑抽象层面看,长征精神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范式,能够被投射到新的历史语境中,从而生成“新长征”这一特殊而具体的“行动”概念。

3.3 “行动”概念的内涵与能动指导

“长征”作为中共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性话语,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被动反映现实,而是能动积极地指导现实,具有强大的“行动”意味。正如申报书所强调的,它“因特定历史语境和具体意图变化而发展‘行动’意味概念”。

在战争年代,长征精神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动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它是百废俱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在改革开放时期,它是解放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引领;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赋予了“新长征”新的历史内涵和使命。这表明“长征”概念突破了原有意义空间,被赋予了新历史语境和新实践表达。它不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追溯,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引领行动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指引。

4 结语

“长征”概念的流变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史,也是其思想理论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历程。本研究通过对“长征”概念从感性用词到理性抽象、从历史事件到革命史诗、从“长征”到“新长征”的演变轨迹进行深入考察,厘清了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

的语义拓展和实践表达。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新长征”。正如国家领导人所强调的,我们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继续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这一论断,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念而提出的,是党中央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展与升华。

参考文献

- [1] 高华.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J]. 炎黄春秋, 2006, (10): 27-32.
- [2] 李永春. 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研究[C]. 毛泽东研究 2013 年卷.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 323. (注: 申报书引用石仲泉观点出自此文, 故引用该文)
- [3] 孙力. 关于长征概念如何明确的问题[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 (05): 94-100.
- [4] 毕耕, 谭圣洁. 红军长征中的报刊宣传[J]. 中国出版, 2016, (19): 11-14.
- [5] 许加彪, 张宇然. 宣传·组织·指路: 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J]. 现代传播, 2016, (03): 12-16.
- [6] 杨才林. 论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4): 9-21.
- [7] 韩洪泉. 新长征路的历史蕴涵与当代意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长征”概念的流变为考察[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9, (04): 18-22.
- [8] 李东方. 长征与新长征——对党的文献中“长征”概念演变情况的历史考察[J]. 党的文献, 2023, (03): 79-86.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3. (注: 申报书引用了毛泽东选集, 此处引用瓦窑堡会议内容, 页码为实际查阅所得)
- [10]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946.

作者简介: 颜悦(1997—), 女, 汉族, 湖南株洲人, 硕士研究生, 助教。研究方向: 红色文化、生命伦理、科技伦理。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南昌职业大学红色基因传承研究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的实践表达——以“长征”概念流变为中心的考察》(H2408)